

陆荣廷政权在边疆民族经济融合进程中 运用的政府和民间两种力量*

唐 凌

【摘 要】 陆荣廷为首的桂系集团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群体，对其历史作用应进行多元化评价。他们利用政府和民间两种力量清除了部分落后的社会政治制度和邪恶势力，扩大了近代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组织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广西新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同时推动了边疆民族经济融合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关键词】 陆荣廷政权；民族经济融合；力量

【作 者】 唐凌，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桂林，541001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54X (2007) 04—0154—011

The Governmental and Folk Powers Used by Regime of Lu Rongting during the Course of Ethnic Economic Fusing in the Border Area Tang Ling

Abstract: The Guangxi clique of warlords that headed by Lu Rongting was a complicated political colony, the historical effect of which should be evaluated with diversification. They used the governmental and folk powers to eliminate some laggard social political system and depraved force, which extended the influence upon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nd social economic organs, and established the new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attern of Guangxi to some extent as well as impelled the course of ethnic economic fusing in the border area.

Key words: regime of Lu Rongting; ethnic economic fusing; power

一、政权是历史发展动力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民族经济融合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过程。考察陆荣廷政权的作用，应关注他们所利用的政府及民间力量。

陆荣廷从 1912 年利用辛亥革命爆发登上广西都督职位，控制了广西，到 1924 年被新桂系集团逐出广西，丧失自己的政权，前后统治广西 13 年。陆荣廷政权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但是却采取了不少措施来促进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于这一点，人们在研究中一直予以高度的关注，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大都把他的这些措施视为维护自己统治，壮大自己力量，与北洋政府及

中国知网 <http://www.cnki.net>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以来中越边区经济开发及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政府与民间力量的比较研究”子课题（桂科软 05111010 号）。

其他封建军阀进行争斗的一种需要。这种解释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是，若对此进行历时性考察，便可发现单一的政治决定经济发展的解释方法显然不够科学。

本文选择民族经济融合这一角度来论述陆荣廷政权的经济措施。所谓民族经济融合就是不同民族的经济通过交往渗透形成新的复合体的过程。进入近代社会后，民族经济融合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广西地处华南边陲，多民族聚居，在外力的作用下，各民族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与过去相比，经济融合的进程甚为显著。通过分析陆荣廷政权所采取的措施与民族经济融合的关系，既有助于人们了解在近代华南边疆经济发展中长期起作用的一些因素，也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历史动力理论的认识，了解民族经济融合是人类社会发展最持久最有效的推动力量之一，即便是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也是如此。

陆荣廷政权在促进民族经济融合，发展实业中主要运用了两种力量，即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这两种力量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但其基本作用都是积极而有效的。

二、陆荣廷政权利利用政府力量清除部分社会邪恶势力及落后的政治制度， 创设有利于民族经济融合的环境，同时，通过任用新式实业人才， 制定奖励实业政策，推广和引进特色及先进产品等途径， 培育民族经济融合的发展性因素。

民族经济融合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制约性因素。陆荣廷政权建立后，一方面，从政府层面采取以下措施来予以消除。

1. 大力开展剿匪行动，整治社会秩序，创设有利于民族经济融合的环境。

边疆地区由于地瘠民贫，山高林密，匪患历来严重。据载，仅 19 世纪上半叶，广西境内发生的“叛乱”、“起义”、“暴动”、“战争”等有 67 起之多。^①进入民国后，“政纲解纽，党派纷起，邪说滋兴，”社会更为动荡。在移民比较集中的湘桂走廊和西江流域、左右江流域，抢劫、贩卖鸦片、赌博等现象呈蔓延之势。移民中许多人从事商业，他们的商品经常遭到土匪的抢劫，损失惨重。^②甚至外国商人也无法幸免于难，如 1915 年初，土匪将航行在西江的外商轮船洗劫一空，“意欲惹起国际交涉”。^③1917 年 7 月，日本三菱合资会社香港分社的森清太郎和镰田六三郎以游历身份到广西查勘锡矿，在贺县境内被土匪绑架，索要巨额赎金，造成很恶劣的国际影响。^④日益蔓延的匪患制约了实业发展与民族经济融合。因此，陆荣廷政权建立后，采取一系列的清匪军事行动。仅 1912—1914 年，就“剿办大小股匪共 1060 余起之多，获办匪徒共达 7800 余名。”^⑤1915 年的军事行动同样猛烈，“迭次破获著名匪首前后数十名”。^⑥此后，又在西江和左右江流域重点开展剿匪行动，以保证国内外的商船顺利通行。^⑦持续不断的剿匪行动在很大程度上遏止了匪患，虽然社会的政治动荡仍未能平息，但是，经济移民的生产能够进行，外省和外国商人、企业家能够在广西投资经营，这就使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民族经济的融合有了重要的前提。

2. 继续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废司设县”，逐渐清除民族经济融合的障碍。

广西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实行土官制度。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这一制度已经成为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生活方式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障碍。因此，明清以来，开始实行“改土归流”政策。陆荣廷政权建立后，首先为土官争取在议会中的政治权利，促进了土官与流官的合作与交流。^⑧接着从“废司设县”入手，逐渐清除土司制度所设置的政治障碍。1915 年，分别以红水河和右江两大流域为中心，取消 9 个土司地区的行政区划，设立都安、隆山、果德 3 县。^⑨1916 年又将忠州等 10 个土司改置为忠县、镇结、龙茗、思陵等 4 个县。^⑩1917 年，天保县承审的向武土州和奉议县承审的都康、上映两土州的绅商见势主动呈请尽快实现改土归流，陆荣廷当局顺势及时地将向武、都康、上映 3 土州合并，设置向都县，由田南道管辖。^⑪与过去相比，这一时期改土归流的成效非常显著，1912—1917 年间，实现改土归流的土司已有 22 个，其数量超过所存土司的一半。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此时“废司设县”的大都是壮族地区。陆荣廷出身于壮族家庭，他深知改土归流不仅会

削弱土司势力,而且也会使壮族民众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但是他也懂得在经济重心不断南移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在广西不断扩张的情况下,壮族民众越是封闭自己,对自己的长远发展就越不利。所以他非常果断地裁撤了壮族地区的土司,甚至在各土司所辖的土地都尚未丈量、田赋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就设置了新县,规定这些事情一律交由改置后的各县知事“次第举办。”土司官裔应“编同齐民,各安生计”。个别确有才能,且得到土民认可的土官,可由省政府向中央提出任用的方案,以示体恤和确保统治的稳定。^⑩新县的设置,扩大了民族间交往融合的途径,经济移民得以顺利地进入这些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随之在这些地区传播。经济融合使民族间的关系逐渐改善,社会矛盾逐渐缓解。社会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

另一方面,从培育民族经济融合积极因素的立场出发,采取了以下措施:

1. 任用新式实业人才,使其将先进的生产技术、经验推广到各地。

广西长期以来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先进的生产技术、方法难以引进推广。明清时期,随着经济移民的到来,^⑪这种状态有一定的改善。但是,由移民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方法速度较慢,范围也受到较大的限制。陆荣廷政权建立后,通过大力任用实业人才,加快先进生产技术、方法的推广,有效地促进了民族经济的融合。例如,1914年7月,明江县知事需要补缺,陆荣廷桂系集团向袁世凯政府保举候补县知事黄伯孝充任。黄伯孝为广东梅县人,时年39岁,广东法政学堂理财特别科毕业。曾于宣统三年(1911)任广东农林实验场文牍报告兼农林讲习所经济学教员,民国元年(1912)任广东实业司署总务科科长兼《实业公报》编辑,次年7月任广东行政公署实业司第一科科长兼公报总编辑,10月荐任为广西柳江观察使署秘书。后赴京参加第一届知事实验,取列乙等。^⑫他任明江县知事期间,逐渐把广东先进的农林生产技术、方法予以引进推广,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族经济融合。同年9月,桂系集团又任命傅作霖和黄占梅分别为桂平县知事和北流县知事。傅作霖为江西丰城县人,曾于宣统三年(1911)任江西省清理财政局庶务科员,后参加第一届知事实验,取列甲等,被认为“识练才优”。黄占梅为福建永定县人,曾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充任南洋吡叻矿务文案,次年任漳厦铁路总稽查。民国元年任福建民政司地方科科长。后参加第一届知事实验,取列乙等,被认为“识解明通,才猷卓越”。^⑬他们了解近代经济发展的走向,掌握管理近代企业的基本方法,同时又对江西、福建等地经济建设有着深切的体会,并取得过较优异的绩效。因此,担任县知事后,也有效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民族融合。据统计,从1914—1916年间,陆荣廷为首的桂系集团向袁世凯政府保举任用实业人才,除以上列举的之外,共有15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候补道尹于荫堂、^⑭上思县知事张明善、^⑮南宁交涉员崔肇琳、^⑯道尹董乔羽等^⑰。必须指出,1914—1916年,正是中国借鉴国外经验,尝试通过文官考试制度选用官员时期。^⑱陆荣廷集团在这3年之内向袁世凯政府保举任用上述新式经济人才,与这种制度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是,若把这种制度的规范作用视为陆荣廷集团任用新式经济人才的唯一理由却有失偏颇。检索北洋《政府公报》有关陆荣廷集团的报告,电文,可以发现在其主政广西的13年时间里,未经过文官考试而被任用的各级各类新式人才(其中包括经济人才或经济、政治、文化能力兼具的人才)不下50人。^⑲这些人才同样大都为外省籍,接受过较高的文化教育,具有较丰富的从事经济工作和行政工作的经验。陆荣廷桂系集团保举他们担任要职,目的就是要利用他们的知识和经验,改变边疆地区封闭落后,实业不兴,社会动荡不安的状况。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他们在广西边疆地区发展实业,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方法,实现民族经济融合面临许多困难,但是由于他们文化及政治素质相对较高,不畏艰难,“筚路蓝缕,规划周密”,因此大都有所作为。桂系集团对他们取得的业绩给予充分肯定。^⑳如果说明清以来经济移民越来越多来到广西,为民族经济融合创造了外部条件的话,那么,陆荣廷集团任用新式经济人才,则创造了一定的内部条件。这两者的结合,使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与民族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2. 制定奖励民族经济融合、发展实业的政策。

广西有较丰富的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农林资源等在全国位居前列。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经济开发却异常困难。根据这种情况,陆荣廷政权组织力量开展全省的资源及实业状况调

查，如 1913 年 5 月在农林部专家的配合下，对农会、农业实验场、农产等进行调查。^{②3}1915 年，省政府各部门又在张鸣歧的带领下，对各县的实业情况开展了巡查，得出本省商贸基础薄弱，且受欧战影响难以发展，工业缺乏企业及技术支持，尚未具备设立条件的结论，认为应着重把实业放在农业和矿业方面。^{②4}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章程、政策，促使民族经济融合，发展实业。如规定凡垦荒、植树、牧养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者均可获奖，尤其通过集资创办农林公司发展实业，更应受到鼓励。^{②5}锰、锑、锡、铅等矿允许民众自由开采，可免出井税 3 年。为确保这些政策得到有效实施，桂系集团还多次向袁世凯政府陈述理由，争取其支持。袁世凯政府从稳定边疆，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出发，原则上予以认可。^{②6}在战乱频繁的社会环境里，发展实业存在着很大的阻力。但是，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又使民族经济融合存在着基本的动力。桂系集团的上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社会实业界和各地民众发展实业的积极性。桂西的荒地较多，矿产资源也大都集中在这里。因此，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经济移民和矿业公司把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这些地方。在开发广西农业和矿业的过程中，各民族的联系得到加强，经济落后的状况有所改变。

3. 推动特色农矿产品走向世界，编织联系民族经济的纽带。

民国时期，广西的整体生产水平在全国处于较低层次，但也有部分特需或特色产品具有较重要的应用价值。特需或特色商品是一种特殊资源，在市场中具有不可替代性或互补性。当这些产品为其他民族所必需时，就会成为联系各民族经济的纽带。为了开发利用这些产品，桂系集团根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的要求，督促有关部门提高其产品质量，同时，通过国际博览会和国货展览会等渠道，努力将其推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如 1916 年，在农商部举办的国货展览会上，广西共获一等奖项，二等奖项，三等奖项，褒扬奖项，见下表：

1916 年国货展览会广西获奖产品统计表

等级	品 名	出品人或制造人	备 注
一等奖	锡砖	庆云公司	全国获一等奖的产品共 541 项，广西占 11 项。
	锡砖、黑铅	富贺官矿局	
	丝	省立蚕业学校	
	木棉花	吴宝森	
	天蚕丝	广寿隆号	
	土棉花	马顺合号	
	茴油	天保镇安崇林业公司	
	桐油等	李荣英	
	各种药材	黄 镪 奎	
	各种药材	吴宝森	
	各种药材	李荣英	
二等奖	杭罗云纱	邕宁蚕业讲习所何永德等	全国获二等奖的产品共 658 项，广西占 15 项。
	烟煤	煤锡公司	
	南山圣种白毛茶	宝华公司	
	丝茧	苍梧蚕业讲习所	
	蚕宝模型	省立甲科种蚕学校	
	生丝	邕宁蚕业学校	
	苎麻青麻罗麻	李荣英、吴宝森、周德源	
	丝茧	蚕业养成所	
	茶油、八角油	吴宝森	
	茴油	苏承祜	
	线织	艺术女学	
	竹筐	陈有成	
	□皮	吴宝森	
	草席	蔡邦智	
	信箋	如意祥瑞记	

等级	品 名	出品人或制造人	备 注
三等奖	毯子	富川瑶人	全国获三等奖的产品共 750 项, 广西占 16 项。
	铁矿	裕国公司	
	桃榔木、土格木、黄杨木	百色周德源	
	农产物品标本、冰糖、黑米及各种杂粮	吴宝森	
	白糖、蜂蜜	李荣英	
	蓝靛	张顺祥	
	烟叶	苏梦祥	
	白花草、苍术、蛤蚧	天保石孟涵	
	明桔梗	兴安黄福奏	
	砂仁	百色潘环记	
	走马胎胶	龙州施耀川	
	耳环草	龙州邝寿山	
	明角桃仁	百色广隆号	
	刻竹器	唐源江	
	刻山水竹器	应芳	
	绸织桃花	女子初等小学	
褒扬奖	锑矿	宾阳李福田	全国获褒扬奖的产品共 417 项, 广西经济类产品占 6 项, 非经济类产品未统计在内。
	云耳、木耳、锑矿	李荣英	
	毛毛谷	韦福国	
	生丝	王荣记	
	蛤蚧	陈志康	
	葛仙米	天保石孟涵	

资料来源：钟文典、唐凌、朱从兵主编：《北洋〈政府公报〉中的广西史料》第 3 卷第 26—29 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又如，1917 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广西送展的农矿产品获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8 项，三等奖 11 项，四等奖 13 项，合计 33 项。^⑦

这些产品有的由企业、商号、学校完成，有的由个人完成。产品的地区分布只有少部分在城市，大部分是在县、镇甚至少数民族农村。如此多的矿产品、手工业产品和农产品在国货展览会上获奖，不仅增强了边疆地区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和自信心，而且也为各国各民族了解广西边疆地区的特色产品、资源，促进民族经济融合创造了有利的机会。桂系集团在此过程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实业部门的官员做了大量的工作。^⑧广西的获奖产品比例虽然不高，但是，能把推动特色产品走向市场作为政府的主要工作，说明其职能开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4. 引进先进的作物品种，提高产量及经济效益，促使民众改善农业结构，将先进的经济因素融合于生产之中。

高产的农作物品种通常会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因此，不同的民族不论其发展程度如何，对这些农作物品种都会积极引种。陆荣廷桂系集团根据中央农商部的布置，逐渐将一些高产的农作物品种引进本省，除粮食作物外，还有南洋的水果，欧洲的经济林木等，例如，1914 年，农商部就把“生长迅速，效用宏多”的德国刺槐推广到全国各地。^⑨1917 年，广西省政府购买 10 斤刺槐树种分发各县种植。^⑩广西的地形和气候很适合这种槐树的生长，引种后很快成为一重要的经济林木。据《广西通志·农业志》载，杂交水稻、小麦、玉米、红薯、菠萝、芒果、花生等作物大都在明末清初从外地引进，民国初年其种植面积开始逐渐扩大，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已达数十万亩甚至数百万亩。^⑪其中，政府设立的实验场、林艺实验场等农林技术机构及劝业道、农会等行政机构为这些高产农作物品种的引进与推广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陆荣廷政权利利用民间力量推行近代企业制度，发展交通与银行，维护商埠的功能，使边疆民族经济融合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民国建立后，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民间实业力量日趋活跃。陆荣廷政权为稳定边疆，强固统治，积极利用民间力量促进民族经济融合，发展实业，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1. 鼓励民间推行股份制，筹集社会资金，开发林产和矿产，奠定民族经济融合的制度基础。

股份制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以公平合理的规则，确定投资者的权利与义务，促使各种社会资金有效汇集，为企业、公司等经济实体的创办及发展创造条件。工业生产力出现后，股份制是最能体现民族经济融合成效的因素之一。虽然清末广西已有股份制企业，但是由于未能得到政府的支持，这种制度的推行阻力甚大，尤其是广西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股份制企业——振华公司因政治势力左右而破产倒闭的事实，使社会各界对股份制心存疑虑。^②陆荣廷政权建立后，积极鼓励民间商人以招商入股的方式，筹集资金恢复和扩大矿业和林业生产。1913年1月，陆荣廷制定了一个实业建设计划，即向广东农工商兴业公司借款50万金镑，同时也广泛筹集其他社会资金，发展矿业和林业。^③1915年，张鸣岐考察全省实业情况后，提出“以实业论，桂省富于矿产，实为最大利源”。“本地商民资财有限，不能从事开采，实非招致外省巨商不为功。”同时，“飭由绅商组织垦植协会”，动员社会力量扩大各类林木的种植面积，使之不断“行销外洋”，获取利益。^④桂系集团还特集资设立诚直林业公司，在邕宁城北40余里小高峰一带种植八角、玉桂、杉、松等树。^⑤用实际行动推行股份制。不久，绅商纷纷集资设立农林公司，开发本省特色农林产。当时，国际市场对广西的桐油和茴油有很大的需求，价格日涨，“厚利所在，一时种植者，风起云涌。”^⑥矿业也得到一定发展，如1913—1915年，获中央政府批准在河池南丹开采的锡矿区共有7处，这些矿区大都由两粤商办广福公司和庆云公司开采。^⑦而这些公司都实行股份制。此时，广西有各类工厂6种，各类产品180多种。^⑧这些工厂同样也大都实行股份制。桂系集团还力图把股份制运用于西江的疏理。西江航道由于长年失修，不少河段江底淤积，既妨碍航行，也易引发水灾，危及民众财产生命安全。1914年，旅京粤籍梁士诒等120人要求政府派专员督办西江疏理事宜，给袁世凯政府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⑨陆荣廷桂系集团非常支持疏理西江，主张采用招商集股的方法解决资金不足的难题。虽然由于派系之争使疏理西江的计划未能及时实施，但是桂系招商引资的建议由于体现了民众的意志，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股份制在广西引进较晚，加上民众普遍较贫困，社会资金十分有限，因此，本地民众接受这种制度的思想基础和经济基础相对较差。民国初年动荡的社会局势更是制约了股份制的推行。但是，陆荣廷桂系集团为鼓励民众投资企业、公司，发展实业，坚持推行股份制，既给予政策方面的支持，也在实践中积极予以示范。虽然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不是很突出，但是，这些做法对促进民族经济融合，引导广西实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2. 维护轮船运输航线，提高商品的流通速度及容量，扩大民族经济融合的空间。

清末民初，随着华南边疆经济开发的深入，商品的流通量逐步扩大。国内外轮船公司借势纷纷开辟广西内河及沿海航线。仅1915—1921年，向中央政府登记航行于广西境内的商船就有近40艘，重量以400—600吨为普遍，最大的为907吨。航线以南宁至梧州、梧州至广州、香港为多。^⑩水路是当时广西的主要交通线，进出口贸易大部分都要通过商船运输。因此，桂系集团除及时剿灭在各航线抢劫的土匪，以保证各商船安全航行外，还通过登记的途径，规范各业主的经营行为，让社会了解其实力及特点，以便其业务量得到有效扩大，从而实现自我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出口贸易受到严重影响。桂系集团仍尽力维持轮船航线的开通。政府统计资料显示，这期间，广西各航线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还新开了梧州至柳州、桂林的航线。如江鹰号、平乐号、柳江号、东波号等商船就是如此。^⑪不可否认，广西的农、矿产品在国内及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大的需求量，这是航线之所以畅通的重要前提，但是也应当承认，桂系集团提供的安全环境和商船通过登记而获得

的社会资质及资源,同样是这些航线畅通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轮船航线的开辟与增多,使商品的集散速度及容量迅速提高,从而使民族经济融合的空间大为扩大。

3. 寻求山西票号支持发展银行业,使边疆地区的民族经济融合获得一定的金融助推力。

银行业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民国初年,陆荣廷桂系集团一方面在前清银行的基础上加大资金投入,使其力量得到加强,另一方面,则寻求山西票号的支持,力图借助其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提高银行的效益。桂林日升昌票号管事王治臣被他们聘请主理银行事务。广西银行成立时,资本总额为平花银100万两,其中广西官营钱号(广西银行的前身)原有资本55万两,官银钱号历年赢余33万两,藩库增拨11万元。^②这有限的资金要保证广西各种实业活动的开展和政府工作的运转无疑十分困难,但是王治臣及其所带来的各部门领班、伙计等数十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帮助广西银行站稳脚跟,并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较可观的经营业绩。为此陆荣廷桂系集团特请求大总统袁世凯授予他五等嘉禾勋章,“以励前劳,而策后效”而获准。广西银行当时主要为陆荣廷政权筹饷,但与此同时,也为实业的创办提供了一定的帮助,至少当时的一些矿业公司和林业公司从中获得若干资金。桂系集团通过借助山西金融商人的力量来发展银行业,加强了广西与山西的经济联系,开拓了国内市场。“自时厥后,粤、沪、湘、鄂转汇灵捷,指臂相应。”^③虽然后来由于陆荣廷政权滥发纸币导致金融危机而使广西银行破产,但是,该政权在历史上借助民间力量发展银行业,促进民族经济融合和实业发展中所做出的努力及贡献不能否定,尽管这种贡献十分有限。

4. 利用绅商力量阻止省会复迁,使南宁商埠对华南边疆民族经济融合的辐射功能得以发挥。

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各政治派别斗争激烈,广西省会由桂林迁移到南宁。随着陆荣廷政权的建立,部分省议会的议员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又极力要求将省会迁移回桂林。社会各界因此引起了新的争论。当时,南宁及其周边各县的共102名绅商上书省政府,坚持将省会设在南宁,反对复迁桂林。理由主要是:一、邕江为西江主流,近代以来,外人开放的商埠大都设于此。若将省会复迁桂林,不利于对外联系。二、南宁的商人大都为外省资本家,商埠的开放使交通得到进一步改善,到此投资者日众。复迁省会于桂林,势必给政府和绅商造成重大损失。三、南宁物产丰富,设省会于此,有助于开发物产资源,经济实边,巩固国防。当然,绅商坚持设省会于南宁的理由还有利于维护中央的政治权威等,但是其基本立足点则是要求不能弱化相反还必须强化南宁的商埠功能。^④陆荣廷将绅商的上书呈报中央政府。因将广西省会设于南宁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意志,因此,对绅商提出的要求当即予以支持。陆荣廷政权利用绅商的力量,成功化解了迁省危机,从而使南宁的边疆经济重镇地位得以巩固。坚持设省会于南宁有利于民族经济融合,因为正如绅商所言,南宁居广西东西之中部,四通八达。邕江为左右江之总汇,非常有利于航运业的发展。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广西巡抚黄槐森奏请自开为商埠后,^⑤其商业地位已在桂林之上。省会设于南宁,使其政治和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左右江流域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南宁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上升,使该流域有了一个先进的经济文化传播源,这对改变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状况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经济重心的出现,也必然促使广西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结构性调整,相应地,市场的动力就会得以形成。设省会于南宁使社会的资源得到有效开发及利用。据海关资料,1911年,南宁的直接进口及转口进出货值仅为4700922关平两,而1912年却迅速增长为7034714关平两,到1919年,又进一步增长为7992529关平两。^⑥由于进出口货物在南宁大量集散、中转,使梧州、龙州、北海的对外贸易量也呈逐年增长态势。商业贸易的发展,又促进了附近乡镇墟市的繁荣。毗邻南宁市的武鸣等县,墟市数量居全省之前列。^⑦社会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利用,不仅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各地区各民族共同参与到市场中来,从而实现民族经济的进一步融合。

四、探讨陆荣廷政权利用两种力量促进民族经济融合,发展实业的原因,既要把握经济与政权的关系,也要把握民族与政权的关系。

必须在这个过程中经受考验。凡是发展较快的国家、民族，通常都能有效地利用民族经济融合的积极因素，克服制约因素。近代以来，工业生产力的推动使民族经济融合的速度越来越快，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陆荣廷政权只存在了 13 年的时间，而这期间恰值中国社会转型，政治、经济、文化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对陆荣廷桂系集团在民族经济融合中所运用的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应根据这种社会背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

如前所述，政权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动力元素。陆荣廷是这个政权的核心。综观其一生的活动，可发现他的所作所为十分复杂。他严厉镇压革命党人的反封建反独裁斗争，赞同复辟帝制，穷兵黩武，与袁世凯及其他地方势力争权夺利，这些行动表明他具有鲜明的封建军阀特征，但是，在他所统治的华南边疆地区，也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促进民族经济融合，发展实业。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封建军阀的基本属性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此，我们不能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视角来认识其动因。他之所以采取措施促进民族经济融合，发展实业，主要取决于以下原因：

从陆荣廷政权存在条件考察，财政困难使其不能不促进民族经济融合，发展实业。

清末民初，战乱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度摧残，国家财政处于崩溃边缘。陆荣廷政权一成立就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发展社会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正如其所言：“当此改革伊始，内外财政同此艰困。在中央既难接济广西，而广西为东南屏蔽又未束手待毙，贻误大局。”^⑧而要发展社会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就不能不促进民族经济融合。因为广西地处华南边陲，缺乏资金、技术、人才。必须将内外的先进生产力因素结合起来，才能获得近代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可见，财政困难是陆荣廷桂系集团促进民族经济融合的重要原因。

从社会经济规律考察，陆荣廷桂系集团通过促进民族经济融合来发展实业在较大程度上受经济重心南移的规定。

众所周知，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大致从南宋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重心不断南移的过程就是民族经济融合的过程。明清之际，华南边疆成为经济移民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移民与土著居民为争夺生产和生活资源曾开展过长达上百年的械斗，即“来土械斗”。斗争的结果是移民的势力逐渐壮大，这不仅表现在人数逐渐增多，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近代以后，虽然“来土械斗”仍未停止，但是土著居民已开始自觉地接受经济移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关于这一点，只要将耕作方式、收入结构、饮食结构、婚姻关系等进行比较研究就不难得出结论），这就使民族经济融合具有了一定的基础。据地方志记载，清朝中晚期，中原地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在广西许多地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普及。在民族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往往对欠发达地区的民族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明清以后广西成为经济移民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因此，受这种影响也就最深刻。正是这种历史的规定性，使陆荣廷政权能利用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来促进民族经济融合，发展实业。作为封建军阀的代表，陆荣廷的统治理念及方法并无过人之处，但是，社会发展的进程却给他提供了创造历史功绩的条件。对此，我们应当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

从政权关系考察，陆荣廷采取措施促进民族经济融合，发展实业，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存在一定的关系。

清末“新政”造就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第一次实业高潮，与之相适应，政府职能开始发生了一定的转变。民国政府建立后，其经济建设的管理职能进一步加强。陆荣廷政权在其推动下不能不主动作为。如 1913 年，中央政府农林部要求各省选送优良水稻品种到京，以便开展实验，广西未能按时完成这一工作，被农林部发文催促。^⑨1915 年 2 月，农商部为使有奖储蓄票顺利发行，有效筹集实业资金，要求各省商会动员各地商铺积极代售，以“利国利民”。^⑩5 月，又催促各省积极筹款发展特色农业，使之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⑪至于总体的经济建设计划及执行情况，更是不断进行检查、督促。陆荣廷政权虽然具有很强的封建割据性，但是，由于实力有限，不足以与袁世凯为首的中央政府公开抗衡，更重要的是由于其本身有发展经济的迫切需求，因此，对于中央政府推动实业的措施基本上予以配合、支持，尤其是在利用外力促进本省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出较高的

热情,并往往给外商投资发展矿业、农业、商业等许多特殊的条件。^②与此同时,陆荣廷政权也加强本省政府的实业职能。1913 年底,省实业司科长何永福因“性情乖谬,行止不端”,无法有效推进实业建设而被撤职查办。^③对于影响民族关系,有碍外商投资或经济移民生产的行为,经常责成有关部门纠正或惩办。据统计,1917—1924 年间,经广西政府处理并在公报上公布的经济案件近 30 起,这些案件大都涉及外商的权益,桂系集团基本上能本着有利于民族融合与经济发展原则来处理这些案件。^④政权是一个系统,总体与部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探讨陆荣廷政权促进民族经济融和,发展实业的原因,不能忽略民国初年政府经济建设职能强化所产生的作用。

从陆荣廷及其民族特性考察,桂系集团采取开放措施促进民族经济融合,发展实业,得力于壮族的包容性及进取性。

壮族的族源较为复杂,分布面较广,文化构成多样化。加上壮族历来比较进取,能自觉地接受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因此在少数民族中,其包容性和开放性都是很突出的。陆荣廷出身于壮族,壮族的上述特性不能不对他产生影响。明清尤其是进入近代以后,经济移民的大量到来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使壮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陆荣廷及其同僚所制定的实业计划或向中央政府的报告中不难发现,他们对广西边疆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长期处于落后的状况深为忧虑,认为贫困是造成广西匪患严重的主要根源。而且“广西地连法越,为东南门户,若不设法维持……边患猝发,势将牵动全局”。^⑤而要开发边疆地区,“非招致外省巨商不为功。”^⑥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们制定开放的政策来促进民族经济融合,发展实业。历史已经证明,近代以来,相对于其他边疆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广西边疆的民族经济融合速度较快,成效较显著,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壮族的包容性以及在外力压迫下所增强的进取性。

四、民族经济融合是社会和谐的一种反映。肯定陆荣廷政权利用政府及民间力量促进民族经济融合的意义,有助于人们将边疆地区社会发展的历史资源转化为资治能力。

撇开陆荣廷政权的其他作为不论,仅就利用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来促进民族经济融合,发展实业的措施而言,其历史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清除了部分落后的社会政治制度和邪恶势力,为创设有利于民族经济融合的社会环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陆荣廷政权处于民国刚建立的动荡时期,在短暂的 13 年时间里,不可能使社会迅速地消除动荡,有效地实现民族融合与经济的发展。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却为华南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条件。如前所述,陆荣廷统治期间在全省境内尤其是左右江流域和西江流域开展了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清匪行动。不可否认,部分革命党人因反封建统治也被视为“匪”而遭到其剿杀,但是,其剿灭的对象大都是真正的以打家劫舍,谋财害命为目的的土匪。在广西历史上,剿匪行动如此之频繁、之猛烈是不多见的。这些行动沉重打击了社会的邪恶势力。另外,改土归流进一步削弱了土司的势力,加速了土司制度的崩溃。而利用民间力量阻止省会复迁,则抵制了政治和经济复旧的图谋。通常情况下,政治措施都不可能立刻产生明显的成效,而必须经各阶层各组织机构的实施后才能转化社会发展的动力。现在人们对 20 世纪 30 年代的广西建设给予了较多的肯定,但是,若把这些建设成效仅归结于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却有失公允。事实上,陆荣廷统治时期清除部分落后的社会制度和邪恶势力后,进步、公正的社会秩序才有了建立的前提。因此,当新桂系集团打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旗号,推行“三自”、“三寓”政策时,外商才愿意到广西投资创办实业,当地民众才会提高生产积极性,民族经济融合才能不断推进。历史的发展过程不能割断。根据历史发展的逻辑关系,我们把陆荣廷政权的上述措施视为广西近代有序社会的创设条件之一是有其一定根据的。民族经济融合只有在有序的社会环境下才能实现。既然陆荣廷政权的上述措施有助于这种环境的创设,就应予以认可。

2. 扩大了近代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组织的影响, 强化了华南边疆地区民族融合的思想文化基础。

历史发展规律告诉人们, 一场革命过后, 最容易也是最先变化的是政权和政治结构, 其次是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组织形式, 最后才是自然禀赋和财富存量的变化。民国时期, 广西社会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第一个层面。但是, 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组织也开始有所更新。陆荣廷桂系集团为利用外资发展实业, 不仅鼓励股份制企业的创办, 而且自己也组织公司以为示范。当股份制企业在经营中发生矛盾时, 还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股东的利益。正因为如此, 股份制得到广西社会的普遍赞同而逐渐推广开来。广西的农林业、矿业、工业通过股份制这一纽带, 与外商和外地市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民族经济融合的进程得以加快。商会组织在陆荣廷统治时期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据统计, 从1907—1944年, 广西各地设立的商会共有41个, 其中, 陆荣廷统治时期设立的有11个。^⑦这些商会组织, 除制定同业行规, 协调内部关系外, 主要是吸收资金、技术、人才, 开拓市场。无论陆荣廷政权的措施是否真正体现了他们对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组织的深刻认识及其作用的正确把握, 只要这种行为客观上存在并真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那么,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必然会使自然禀赋和财富存量发生变化。我们知道, 欧洲资产阶级自发明股份制后, 很快就用它聚集起巨额资金, 扩大了生产及市场规模, 创造出无比丰富的物质财富。当他们把股份制推广到世界各地时, 各民族的经济逐渐融合起来。因此, 股份制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端。社会经济组织在增长社会财富方面也具有非常重要作用。如世界贸易组织就是在世界市场不断扩大的背景下, 在商会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使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市场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 生产的互补性和有效性大为提高。该组织自建立后, 世界经济一体化以更迅猛的趋势向前发展。陆荣廷桂系集团在其统治期间推广股份制, 发展商会组织, 不仅促进了民族经济融合与实业发展, 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 使人们开始知道利用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组织来创造财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种思想观念一旦形成, 民族竞争意识和交往能力就会提高。广西经济建设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高潮, 不能忽略这种思想文化因素所发挥的潜在作用。

3. 奠定了广西新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基础, 使边疆民族经济融合获得一定的组织和社会资源保证。

作为一个地处边陲的封建割据政权, 陆荣廷桂系集团不得不依靠外地经济人才发展实业。这些人才在其政权系统中虽然所占比重不大, 但是, 由于他们思想比较进步, 与外省甚至外国有着各种各样的经济联系, 当他们根据各地实际, 利用政权力量发展实业时, 就产生了较大的能量。陆荣廷政权垮台后, 这些经济人才由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仍有不少继续留任。有些人虽然去职, 但是他们在任时所造就的实业人才却逐渐地成长起来, 从而奠定了广西政治新格局。而交通运输线的开辟, 高产农作物品种的引进与推广, 南宁商埠地位的巩固与提高, 又奠定了广西新的经济格局。这种新的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形成, 为边疆民族经济融合和实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组织及资源保证。

注释:

①唐志敬:《清代广西纪事》,第307—399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②如客籍商号刘桂记在灌阳县昆达堡就遭到土匪的拦劫,见《广西巡按使王祖同奏灌阳县知事于凤文孥获邻封反狱首犯拟请奖励折》,北洋《政府公报》5年3月30日,第84号,“呈”。③《大总统申令》,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4年3月22日,第1031号,“命令”。④(日)森清太郎著、王倩译、徐有威校:《被广西土匪捕获》,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102号,第210—2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⑤《耀武上将军督理广西军务陆荣廷呈报广西历年剿办股匪各案并将在事文武供职已久未经补各官分别奖叙以示鼓励文并批令》,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4年8月27日,第1187号,“呈”。⑥《南宁陈炳琨、王祖同虞电》,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4年10月20日,第1239号,“公电”。⑦《耀武上将军督理广西军务陆荣廷奏报桂平镇守使莫荣新继续就职日期代陈谢悃折》,北洋《政府公报》,洪宪元年二月十四日,第39号,“奏折”。⑧《参议院第八十九次会议记录》,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元年12月2日,第215号,“附录”。⑨⑩《广西巡按使张鸣歧呈南宁道属安定等九土司拟请改流置县以顺舆情请示文并批令》,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4年8月6日,第1166号,“呈”。⑪《广西督军兼署省长陈炳琨呈大总统,广西南宁、镇南两道所属忠州等十土司业经改设忠县等四县,谨将筹备经过情形暨成立日期恭呈祈鉴文》,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

5年10月3日,第269号,“公文”。^⑪《兼署内务总长范源廉呈大总统,核议广西田南道属向武、都康、上映三土州合并改设县缺拟请定名向都文》,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6年2月25日,第404号,“公文”。^⑫广西有一定的政治移民和军事移民,但是数量很少。绝大部分是因原籍土地无法容纳日益增长的人口而不能不迁移至此。因其他矛盾激化而迁移至此的移民也主要是为了获得生产和生活资源,故将其基本属性定为经济移民。^⑬《广西巡按使张鸣岐呈请任命邹之联等为西林等县知事并缓覲文并批令》,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3年7月30日,第802号,“呈”。^⑭《会办军务广西巡按使张鸣岐呈请实验及格分发广西之知事傅作霖为桂平知事黄占梅为北流县知事文并批令》,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3年9月12日,第846号,“呈”。^⑮他被认为是“于教育、实业尤所注意”。“器识俱通,才猷精敏,年龄正富,志趣不凡”。见《广西巡按使张鸣岐呈敬举堪胜道尹人员于荫堂等请交政事堂存记文并批令》,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3年10月4日,第868号,“呈”。^⑯他被认为是办理农业实验成绩优异,见《广西巡按使张明岐呈荐张明善试署上思县知事并缓覲文并批令》,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4年3月20日,第1028号,“呈”。^⑰他被认为是“提倡工艺蚕业,均著成效”,见《耀武上将军督理广西军务陆荣廷呈裁缺南宁交涉员崔肇琳才堪任使请录用文并批令》,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4年6月11日,第1111号,“呈”。^⑱他被认为是“阅历宏深,行政理财,实饶经验”,见《耀武上将军督理广西军务陆荣廷、广西巡按使王祖同呈会调董乔羽留桂以资襄助请鉴示文并批令》,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4年11月2日,第1282号,“呈”。^⑲《县知事任用暂时条例施行细则》,民国2年12月7日公布。^⑳对这些新式人才的判断,主要根据报告、电文的陈述事实。^㉑《耀武上将军督理广西军务陆荣廷、护理广西巡按使田承斌呈保荐贤能胡铭棠以备任使庐举事实会呈请示文并批令》,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4年10月29日,第1248号,“呈”。^㉒《农林部文(农字第323号)》,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2年5月21日,第373号,“公文”。^㉓《广西巡按使张鸣岐呈遵令巡行各县事竣回署谨将考察情形都陈钧鉴文并批令》,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4年8月6日,第1166号,“呈”。^㉔《农林部咨广西民政长据庆远府知事苏栢侯呈送拟订〈奖励实业简章〉作为一种暂行办法请查核办理文(农字第294号)》,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2年5月10日,第362号,“公文”。^㉕《广西巡按使张鸣岐呈筹办广西矿务拟请特准免税三年以广招徕而兴地利请示文并批令》,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3年11月20日,第914号,“呈”。另见《广西巡按使张鸣岐呈遵令巡行各县事竣回署谨将考察情形都陈钧鉴文并批令》,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4年8月6日,第1166号,“呈”。^㉖《行政统计汇报》,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6年9月16日,第600号,“附录”。^㉗《农商部长谷钟秀呈大总统各省区办理国货展览会出品人员王善荃等分别请给本部奖章文》,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5年10月30日,第295号,“公文”。^㉘《农商部咨直隶……广西……巡按使……分送德国槐树种子并说明书希转发种植文》,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3年7月12日,第784号,“咨”。^㉙《行政统计汇报(林业实验场)》,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6年8月7—8日,第560号,“附录”。^㉚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农业志》“种植业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㉛唐凌:《振华公司经营活动考评》,《八桂侨刊》1995年第3期。^㉜《陆军上将銜陆军中将广西都督陆荣廷呈大总统陈明广西财政枯竭拟借广东商款专办实业并设立银行规定用途开单请签核文并批》,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2年1月25日,第259号,“公文”。^㉝《广西巡按使张鸣岐呈遵令巡行各县事竣回署谨将考察情形都陈钧鉴文并批令》,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4年8月6日,第1166号,“呈”。^㉞毛寅生:《调查诚直林业公司报告书》,载《广西农林专刊》,1934年第1期。^㉟《调查天保县农业概况报告书》,载《广西农林专刊》,第2期,1935年5月。^㊱《行政统计汇报》,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6年9月22日,第606号,“呈”;另见617号、621号、629号“呈”。^㊲《广西公报》第1期,第12号,民国13年。^㊳《内务部呈广东水患频仍群议疏河拟请拣派大员督办据情呈请鉴核文》,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3年12月9日,第933号,“呈”。^㊴唐凌等著:《自开商埠与中国近代经济变迁》,第326—32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㊵见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7年3月5日,第759号,7月12日,第886号,8月23日,第926号,“通告”。^㊶郑家度:《广西近百年货币史》,第80—8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㊷《宁武将军督理广西军务陆荣廷、广西巡按使张鸣岐呈广西银行总经理王治臣等卓著劳勋有功边局恳请援案奖给勋章以昭激劝文并批令》,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4年2月6日,第987号,“呈”。^㊸《耀武上将军督理广西军务陆荣廷呈据公民谢翌雯等禀恳将迁省桂林成命收回据情转鉴核批示飭遵文并批》,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4年7月29日,第1158号,“呈”。^㊹莫炳奎总纂:《邕宁县志》卷2,第455—456页,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37。^㊺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海关志》,85—8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㊻广西省政府统计局:《广西年鉴》第1回,第443页,1933。^㊼《陆军上将銜陆军中将广西都督陆荣廷呈大总统陈明广西财源枯竭拟借广东商款专办实业并设立银行规定用途开单请签核文并批》,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2年1月25日,第259号,“公文”。^㊽《农林部咨浙江、陕西、广西、新疆都督兼民政长转飭县知事及各农会从速征送稻种文》,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2年8月17日,第461号,“公文”。^㊾《农商部飭第71号》,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4年2月9日,第990号,“飭”。^㊿《农商部咨直隶……桂……巡按使请就地筹款将本省特有物产实力振兴文》,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4年5月30日,第1099号,“咨”。^①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北洋政府时期工矿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另见《广西巡按使张鸣岐呈遵令巡行各县事竣回署谨将考察情形都陈钧鉴文并批令》,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4年8月6日,第1166号,“呈”。^②《大总统令》,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2年11月21日,第557号,“命令”。^③详见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6年至13年各期“布告”。^④《陆军上将銜陆军中将广西都督陆荣廷呈大总统陈明广西财源枯竭拟借广东商款专办实业并设立银行规定用途开单请签核文并批》,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2年1月25日,第259号,“公文”。^⑤《广西巡按使张鸣岐呈遵令巡行各县事竣回署谨将考察情形都陈钧鉴文并批令》,北洋《政府公报》,中华民国4年8月6日,第1166号,“呈”。^⑥《行政统计汇报》,北洋《政府公报》,民国6年8月14日,第567号,“附录”,另见568—581号,“附录”。